

## 錢牧齋的史筆

汪榮祖\*

### 引 言

錢牧齋名謙益(1582-1664)，萬曆庚戌年(1610)進士，明末文豪；然因其以東林領袖接交馬、阮，後又以禮部尚書率眾降清，以至於名列「貳臣傳」，為士人所不齒。現代明史學者吳晗即因錢之「醉心功名利祿，出賣了人格靈魂，出賣了民族國家」，而貶低其學<sup>①</sup>。史家陳寅恪也以為牧齋性格怯懦而喜鑽營，無論在膽識上或氣節上都遠不如其繼室柳如是。陳氏原本箋證錢柳詩之計劃，亦因而改為撰寫歌頌紅妝的《柳如是別傳》。

然而，以今日的價值標準而言，文天祥式的殺身成仁並不足為訓，盡心盡力後的投降也不足為恥，更何況牧齋於降清後冒生命之危險，積極從事反清復明活動，特別是暗中接應鄭成功海師入長江<sup>②</sup>。吾人既不必因其為貳臣而廢其學、亦不必因斥其為漢奸而輕其學。

牧齋在文史之學上的造詣甚高，博而能精，其詩出入宋、元而渾融流麗；其文則本之六經，參驗三史，通唐宋八大家之氣，旁及諸子百氏、稗官小說，故行文縱橫變化，時有絕品，無愧是學問宏博的一代宗師。牧齋也極留心史事，並曾任史館，鼎革之後，於史更有一種使命感。因此，吳晗所謂錢氏在「史學方面成就實在有限」<sup>③</sup>，並不公允。牧齋史學雖不如其詩文之為世所重，然在中國傳統史學裏仍應有其一席之地，值得探討。

---

\* 汪榮祖，中正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。

① 吳晗：〈社會賢達錢牧齋〉，收入《讀史劄記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57年），頁343。

② 陳寅恪：《柳如是別傳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2年），第3冊，頁843-1253。

③ 吳晗：〈社會賢達錢牧齋〉，頁342。

本文僅就牧齋的史筆，作一較有系統的綜述；所謂史筆，取其廣義，即包含其史學思想、歷史價值觀、治史風格與體裁，以及書寫的方法等。

## 史學思想不出經史傳統

牧齋身受中國史學傳統，承繼了淵源深厚的經史之學，故其史學思想不出經史傳統，事屬自然。蓋自儒學興盛之後，儒家尊崇六藝而奉以為經，經與史的關係就密切到難以分割。蘇老泉所謂：「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，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。」<sup>④</sup>很明確的指出：經是史的思想與道德指標。經之所載既然是儒家之道，所以史也就是載道之器，兩者實互為體用表裏；從既往之事來說是史，從道而言就是經，乃是一體的兩面。元人張紳更推衍蘇說，認為史若不本乎經，則不足以成一家之言<sup>⑤</sup>。換言之，任何一家之言都不能脫離經所訂的普遍價值標準。明代的王陽明提出「五經亦史」，使經史的關係更形密切：史由於經得以存其跡以明善惡、示訓誡；既然將經與史同歸於訓誡，所以經史的根本不異。陽明之後，歸有光於其〈史論序〉中，倡導「通經學古」，明言學習歷史必先通經，而後才有價值標準，始可以史為鑒。「經」既然包含的是儒家義理，以儒家義理作為評史、述史的準繩，所以今人每將褒貶善惡歸之於「儒家史學」的道德裁判。

牧齋自難脫離「儒家史學」的價值觀，如謂：「六經，史之宗統也。六經之中皆有史，不獨《春秋》三傳也。六經降而為二史，班、馬其史中之經乎？」<sup>⑥</sup>仍然是合經史為一體的旨趣。牧齋所謂「六經，史之宗統也，六經之中皆有史」，其意無非也是陽明「五經亦史」的另一種說法。牧齋為丙申年(1656)出版之汲古閣毛氏《新刻十七史》作序即有云：「經猶權也，史則衡之有輕重也。經猶度也，史則尺之有長短也。」<sup>⑦</sup>有了經的權衡尺度在胸，然後治史，庶能知輕重、明長短；所謂經史互為脣齒之論，實在不出蘇老泉之已具言。牧齋於致毛子晉函中自謂「舟

④ 見〔宋〕蘇洵：〈蘇老泉史論〉，收入《三蘇先生文集》（明書林劉氏安正書堂刻本），卷3，頁1b。

⑤ 見〔明〕楊慎：《楊升庵文集》（明萬曆壬午刻本），卷47，頁2a。

⑥ 〔清〕錢謙益著，〔清〕錢曾箋注，錢仲聯標校：《牧齋有學集》（以下簡稱《有學集》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卷38，頁1310。

⑦ 同前註，卷14，頁114。

次草《十七史序》，老生常談，迂腐滿紙」<sup>⑧</sup>，雖是學者謙詞，然亦確係中國傳統主流史學之常談。今人常說：「錢氏主張援經入史。」<sup>⑨</sup>實則援經入史其來久矣，不待錢氏主張。因此，牧齋以史為載道之器，可謂上承宋之蘇洵、元之張紳、明之王陽明、歸有光，而下開乾嘉時代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先河。

牧齋認同經史一體觀，固無可疑，然對前人所治經史之學的流弊，頗有所批評與匡正。他在〈左匯序〉一文中即謂：「《春秋》，夫子之刑書也，其亦將以是書為律令乎？」此話乃是針對王安石視《春秋》為「斷爛朝報」而發，意在重申《春秋》所載的道德準則，以便當世之用，所以強調：「居今之世，明《春秋》之大義，闡定、哀之微詞，上醫醫國，此亦對症之良劑也。」<sup>⑩</sup>又說「六經，聖人治世之書也，《春秋》獨佐以刑賞，二百四十二年行事，凜然萬世衰鉞焉」<sup>⑪</sup>。很顯然將孔子定下的大義，視為一種普遍的價值觀，規範人倫；但他同時也覺察到歷史的特殊性，並不能刻舟求劍，認為「欲引《春秋》之義，斷後世之獄，是猶禁奸盜以結繩，理文書以科斗，豈不繆哉」<sup>⑫</sup>！斷獄如此，論史亦然，於此可見牧齋並不自囿於《春秋》書法之中。其實，中國傳統史家雖受到儒家倫理意識的指引，並以此作褒忠貶奸的道德裁判；但是依饒宗頤之見，純粹以《春秋》書法作褒貶的歷史作品，歷代惟出自朱熹一人而已<sup>⑬</sup>，可稱例外。

至於牧齋指出的治經之謬，諸如以主觀的臆測來解經，以杜撰來鑿空作譬說，以偽託石經矯誣亂正，以謬見釋經非聖無法；以及治史之謬，諸如食古不化，漫無折衷；攘遺拾沈，茫無條理；寫史不先立長編，既無凡例，亦不熟悉典要等等<sup>⑭</sup>，都是針對當時學者治學方法與解釋上的弊端與謬誤，提出嚴正的批評。他將這些學術上的失誤，比諸「螻聲而蚋鳴」；意謂：應該發出響亮的蟬聲，卻令人遺憾的只

⑧ 錢謙益著，錢曾箋注，錢仲聯標校：《錢牧齋全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第7冊，頁314。

⑨ 張永貴、黎建軍：〈錢謙益史學思想評述〉，《史學月刊》，2000年第2期，頁19。

⑩ 錢謙益著，錢曾箋注，錢仲聯標校：《牧齋初學集》（以下簡稱《初學集》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卷29，頁879。

⑪ 《錢牧齋全集》，第8冊，頁859。

⑫ 《初學集》，卷21，頁749。

⑬ 饒宗頤：《中國史學上的正統論》（香港：龍門書局，1976年），頁56。

⑭ 《有學集》，卷17，頁568。

聞如蚊子在叫。他的批評同時也呈現了他自期的學術標準，講究實事求是，嚴格校定文字，謹慎闡釋，洞察事跡的來龍去脈，為後來的樸學奠定了基礎，並沒有超越傳統史學思想的大範疇。

### 史學致用不出經世傳統

牧齋以經史為一體，而後求明體以適用；也就是說，通達經史本體的目的是為了便於致用。經世致用原是整個中國史學傳統中的重要支柱，牧齋同時代人亦多同聲倡導，如黃宗義所謂「經術所以經世，不為迂儒，必兼讀史」<sup>⑮</sup>；王夫之也說：「所貴乎史者，述往以為來者師也。」<sup>⑯</sup>莫不肯定史學之用。牧齋論定歷史的實用價值，亦是大矣哉，若謂：「史者，天地之淵府，運數之勾股，君臣之元龜，內外之疆索，道理之窟宅，智胥之伏藏，人才之藪澤，文章之園圃。」他尤喜將歷史比作對付治亂興亡的藥方，更喜歡將世局比作棋局，而歷史正是棋譜。「以神州函夏為棋局，史其為譜；以興亡治亂為藥病，史其為方」<sup>⑰</sup>。他所寫的詠棋詩，亦多反映出經世的感懷，如〈觀棋絕句六首〉之一有云：「寂寞枯枰響沈澀，秦淮秋老咽寒潮；白頭燈影涼宵裏，一局殘棋見六朝。」<sup>⑱</sup>六朝殘局作為棋譜，足可供南明之奕棋者的參考。牧齋因而認為：「善讀史者，如匠石之落材，如海師之探寶，其可以礫肘而量，畫地而取乎？」<sup>⑲</sup>然則，在他的心目裏，史學致用的潛力，可以說是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的。

牧齋認為詩文可有寄託，亦俱經世的含義。蓋詩文並非僅為音韻文字之美而寫，故謂「詩本以正綱常、扶世運，豈區區雕繪聲律，剝削字句云爾乎」<sup>⑳</sup>。所謂正綱常名教，所以講求忠孝節義；欲扶世運，則必講求經世濟民，有為而作。這種思想在錢氏晚年，遭遇到明清鼎革的巨變，憂患尤甚；更因為自愧喪節，除了「援掇禪藻釋典」，沈緬於佛教以求解脫之外，則極力表揚歷史上的忠臣志士，以獲致

<sup>⑮</sup> [清] 趙爾巽：《清史稿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年），第43冊，頁13105。

<sup>⑯</sup> [清] 王夫之：《讀通鑑論》（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66年），卷6，頁12。

<sup>⑰</sup> 《有學集》，卷14，頁681。

<sup>⑱</sup> 同前註，卷1，頁33。

<sup>⑲</sup> 同前註，卷14，頁681。

<sup>⑳</sup> 同前註，卷19，頁831。

精神上的慰藉，對於「不順事二姓而又皈依三寶的人」，「尤道之津津」<sup>①</sup>。牧齋活到八十三歲，目睹明室之亡，隱居荒村，未能如陳子龍等從容赴義，在儒家倫理的壓力下，殊感內咎，所以感懷也特別深刻而複雜，如〈與侯月鷺〉書中有云：「不肖老矣，頭童齒豁，一無建豎。惟此三寸柔翰，忝竊載筆，不用此表揚忠正，指斥奸回，定公案於一時，徵信史於後世，依違首鼠，模稜兩端，無論非所以報稱知己，取信汗青……。」<sup>②</sup>於是歷史自然的成爲錢謙益這位「遺民」寄託遐思、澆洗塊壘之用。他特別對晉末僧人釋慧遠推重備至，因慧遠大師雖身在空門，仍懷忠君愛國之心。這種精神使牧齋既敬又慚，並自覺能知「遠公心事于千載之上」<sup>③</sup>。蓋牧齋所置身千載以下的明室，情勢猶如晉室一般危急；千百年前天子蒙塵，遠公憂之，「唱義軍之先聲，望乘輿之反正，何其義之壯、詞之直也」！而牧齋雖能洞見歷史上這位和尚的「整皇綱」、「扶人極」的「深心弘願」，然自己卻做不到，故「回環展讀」之餘，不禁「涕泗橫流」<sup>④</sup>。錢鍾書於牧齋此一心情有極爲生動的分析：牧齋亟亟發明慧遠心事，表揚其忠貞，正是要托古喻今，「慧遠書晉紀元，陶潛不書宋年號，悠悠千載，至錢氏而始比同。此無他，生世多憂，望古遙集，雲萍偶遇，針芥易親。蓋後來者尚論前人往事，輒遠取而近思，自本身之閱歷著眼，於切己之情景會心，曠代相知，高舉有契」<sup>⑤</sup>。此一分析，深深觸動中國史學史中特有的托古喻今傳統。借古諷今，以古事、時事相互影射、映發的史論，自宋明以來，所在多見，如蘇老泉的〈六國論〉，明論六國媚秦，暗諷北宋賄賂契丹；又如蘇東坡的〈商鞅論〉，明論商鞅，卻暗批王安石之變法。類此，莫不含有經世微意。牧齋亦不出借古人以自明衷曲的傳統，惟其晚歲處境的特異，藉史感慨也就特別深刻了。

## 史法以馬、班自許

至於史書的書寫，牧齋自稱「少讀班、馬二史欣然自喜」；不過，年長後再

① 參閱錢鍾書：《管錐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），第4冊，頁1266。

② 《錢牧齋全集》，第7冊，頁233。

③ 《有學集》，卷42，頁1427。

④ 同前註，頁1428。

⑤ 錢鍾書：《管錐編》，第4冊，頁1266-1267。

讀，才真正通曉二史的史法與文章蹊徑；後來每次重讀，「輒有所得」，衷心感嘆馬、班所建立的典範，難以企及<sup>26</sup>。牧齋無疑將司馬遷的《史記》與班固的《漢書》視為史著的最高境界，若謂司馬氏「以命世之才，曠代之識，高視千載，創立《史記》」；而「班氏父子因之，用炎漢一代之彝典整齊其文，而後史家之體要，炳如日星」，以致於認為史家只要踵事馬、班，即足矣<sup>27</sup>。又嘗謂「編年之有左氏也，紀傳之有班、馬也，其文則史，其義則經」<sup>28</sup>。直將《史》、《漢》視為百世之良法，亦即是中國傳統史學裏開創性的經典之作。在他的心目中，馬、班之後，惟歐陽修「綽有太史公之風」<sup>29</sup>；若馬、班之間，必須分優劣，則牧齋更景慕太史公司馬遷之才，尊為「秦、漢以來，一人而已」<sup>30</sup>。馬、班異同自漢以來，論者已多；惟牧齋論馬、班異同不止於體例文字而已，他曾批評宋人之討論馬、班異同者，不免「尋擿字句」，認為是「兒童學究之見」，所見太小。他主張應「知其大段落、大關鍵，來龍何處，結局何處，手中有手，眼中有眼，一字一句，龍脈歷然」。可見他極重敘事，並未刻意區別文筆與史筆，頗為講究歷史敘事的文學結構。再從書寫的內容看來，司馬遷「上下五千年縱橫獨絕」；而班固則不過是「整齊史記之文」，限於一代<sup>31</sup>。更進一步說，班氏父子雖能「慎覈其事，整齊其文」，然就敘事風格而言，絕非司馬遷之儔。他因而從歷史敘事的角度來評論馬、班的優劣：馬書敘項羽與劉邦爭奪天下以及楚漢興亡的經過，「提綱挈領，較如指掌」，所以可「使後世了然，見其全局」，然而班書過於講究史事的先後排列，因而使事情的來龍去脈被所繫之年月隱而不彰。論者每讚賞班書記事的詳實，但牧齋則認為班書略去了許多精采的敘事，未免可惜。例如馬書敘項羽率軍至於戲西，劉邦屯兵壩上，表出兩軍對壘的形勢，以及明言項羽兵四十萬，劉邦兵十萬，展現出兩軍強弱的態勢，而班書均略而不書。馬書述項伯因張良來告密，劉邦驚慌失措，誘過他人以及巴結項伯等情景，既生動而又傳神，然班書亦均略去不提。馬書提到鴻門宴的座次：項王、項伯東饗坐，亞父南饗坐，沛公北饗坐，張良西饗侍，以示貴

<sup>26</sup> 《有學集》，卷38，頁1306。

<sup>27</sup> 同前註，卷14，頁680。

<sup>28</sup> 同前註，頁688。

<sup>29</sup> 同前註，卷38，頁1310。

<sup>30</sup> 同前註，卷14，頁681。

<sup>31</sup> 同前註，卷38，頁1310。

賤，並特別指出「亞父者范增也」。牧齋認為「於此宴一坐中，點出眼目，所謂國有人焉者也」，無疑是敘事的一大關鍵，卻也不見之於班書。樊噲在鴻門宴中勇猛表現，牧齋謂之「真為噲開生面」之筆，也不被班固寫入樊噲傳。除了〈項羽本紀〉與〈高帝紀〉之外，牧齋所舉類此馬、班之異的例子尚多<sup>32</sup>。班書所略者，或因難以證實之故；所以從牧齋所舉的這些例子可知，他頗為欣賞太史公的「傳神」之筆，讀來令他迴腸蕩氣，似乎更勝過班書之「傳真」。馬書之「傳神」，即錢鍾書所謂「繪聲傳神」之筆，「如見象骨而想生象」；也就是說，司馬遷的許多描述，不過是「設身處地，代作喉舌而已」。故就信實而言，班固略馬之所詳，未嘗不是一種謹嚴<sup>33</sup>。然而若傳神之筆並非無據，「傳神」與「傳真」到底誰更能顯示真相，似難確知。牧齋之尊馬抑班，未必忽視信實，至少可以略知其所好，並不認為文學效果必然有損於歷史敘事之真。牧齋雖然優馬而劣班，只是兩者相較之勝負，並不否定班書之重要，故曰千古之史法，仍然「由二史而求之」<sup>34</sup>。他仍然稱馬、班二史為史中之「經」。

馬、班《史》、《漢》雖可稱作私家撰述，但仍屬史官。中國的史官制度，淵源深遠，可說是中國史學傳統裏的一大特色。史官的職責強調秉筆直書，展現書寫信史的抱負，而這種抱負亦可見之於牧齋。他素以史學自任，且曾於萬曆年間當過史官，無疑以朱明的史官自居，以記載朱明皇朝的國史為己任；他心目中的國史，當然是明而非清。他關切有明二百五十餘年的歷史，一則自感國史無成，又「失于考覈」；二則時人的期待，所謂「虞山尚在，國史猶未死也」，使他心有戚戚焉<sup>35</sup>。他懷抱中國傳統史官的使命感，極其顯然。

此一使命感到牧齋晚年，遭遇到亡國之痛後，更為強烈，將完成國史視為其自期而不可推卸的職責，一心一意想要「以鐘漏餘年，竟紬書載筆之役」，庶幾保留散失的文獻，糾正訛誤，寫成信史。他確在使命感驅使之下，完成明史一百卷；惜因其絳雲藏書樓失火，自稱「西京舊記，東觀新書，插架盈箱，蕩為煨燼」<sup>36</sup>。資料的損失必然慘重，除了嘆息「西京東觀，已屬前生」之外，於〈與李映碧論史

<sup>32</sup> 《初學集》，卷5，頁874-876。

<sup>33</sup> 錢鍾書：《管錐編》，第1冊，頁276。

<sup>34</sup> 《有學集》，卷38，頁1310。

<sup>35</sup> 同前註，卷14，頁687。

<sup>36</sup> 同前註，卷39，頁1367。

書》中，亦說「萬卷五車，化爲焦土。始自知衰遲庸劣，天不復假我以斯文」；雖然如此，他並沒有完全放棄著史的初志，並有待於來者，所以又說「東壁圖書，尚在維揚、淮海間。金鏡未墜，珠囊有待」<sup>37</sup>。至少要在古稀餘年，「優游載筆，詮次舊聞，以待後之歐陽子出，而或有采取焉」<sup>38</sup>，以聊「慰頭白汗青之恨」<sup>39</sup>。他以史自任的決心，昭然若揭。

牧齋晚年縈心國史，擔心無法親自完成，故有所期待於後人。他一向將著史視爲嚴肅而艱鉅的千秋大業，不能草率從事，若謂「史事之難，不在旦夕成書」，然而「今之君子，每一操觚，輒以遷、固自任」，頗不以爲然。至於他推崇以及期待像歐陽修那樣的史家，因歐陽乃「有宋之韓愈也」<sup>40</sup>。韓愈重文以載道，其道乃儒家之道，足見牧齋史學自有主見，仍然不出儒家範疇。他因而像傳統史官一樣，雖以直筆信史自命，莫不受制於儒家正統的主觀之見。然則，所謂直筆也就難以擺脫儒家意識形態的影響；所謂信史，也就是在儒家價值之下的不虛美、勿隱惡。其最終目的，又歸結於歐陽修所謂：「勸善懲惡，昭示後世。」<sup>41</sup>的著史目的。

### 牧齋筆下的明朝開國史

牧齋所寫的國史雖只遺存明朝開國史：《國初群雄事略》與《太祖實錄辨正》，但畢竟留下史學書寫不可或缺的樣本。錢鍾書曾說：「牧齋談藝，舞文曲筆，每不足信。」<sup>42</sup>難辭其咎；然其論史，特別是具有使命感的國史，則力求信實，感嘆「史家之難，其莫難於真偽之辨乎」<sup>43</sup>。其所謂信實，最主要是保存可靠的史料，然後對史實作細心的求證。《國初群雄事略》是現存錢著最完整的一部史書，值得仔細分析。據朱鴻林的考證，牧齋早於萬曆年間家居時已經留意元明之際

<sup>37</sup> 《錢牧齋全集》，第7冊，頁490。

<sup>38</sup> 《有學集》，卷38，頁1311。

<sup>39</sup> 《錢牧齋全集》，第7冊，頁490。

<sup>40</sup> 《有學集》，卷38，頁1310。

<sup>41</sup> [宋]歐陽修：《歐陽文忠公文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7年《四部叢刊》本），卷108，頁829。

<sup>42</sup> 錢鍾書：《談藝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年），頁386。

<sup>43</sup> 《有學集》，卷14，頁686。



群雄事蹟。今傳本雖成書於天啓七年(1627)，並非完璧，但部分篇章可能在天啓朝之前就已寫成<sup>44</sup>。其實，牧齋自謂當時流傳的《群雄事略》只是初稿，而《國初事略》也是同樣情況<sup>45</sup>，都是火餘殘存，很可能後人將二書殘本合而為一。若果係初稿，則必然是長編，此亦符合他素來認為的，著史必先要整理史事長編。今存《國初群雄事略》一書，也很像是長編體例。

牧齋自謂，此書「倣司馬遷楚漢月表之意」<sup>46</sup>，然除編年紀事之外，並不甚同，其意實在為群雄編寫各自的編年體，計有叛方之韓林兒、郭子興、徐壽輝、陳友亮、明玉珍、明昇、張士誠、方國珍、官方之擴廓帖木兒、陳友定、李思齊、納哈出、察罕、何真、何榮，共十五人，人各一篇，記各雄事蹟之本末始終，有如本紀，但卻沒有最後戰勝群雄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本紀，書朱事僅附見於滁陽王。原因是朱元璋出身寒微，最初並不是獨樹一幟的英豪，顯然是為了尊重歷史事實，即牧齋所謂：「漢祖天授，不諱受命于牧羊；光武中興，聊復稱帝於銅馬。」（《國初群雄事略》，頁1）當然也就不必諱言明代開國之祖曾經託命於郭子興。不過郭子興死後，官書不免要諱言元璋之奪權；牧齋錄《太祖實錄》外，別引《天潢玉牒》所謂「滁陽王卒，遂併其兵」（《國初群雄事略》，頁58），又自記「至正十八年(1358)戊戌七月，右丞相郭天爵謀叛，誅之」<sup>47</sup>。天爵者，乃郭子興之子，居然見殺，必然是因為權力鬥爭的結果。牧齋於此秉筆，雖然沒有明言，卻呼之欲出，頗有諱而不隱的一點效果。

元末天下大亂，群雄並起，始作俑者乃韓山童、韓林兒父子。牧齋以大小明王所建之宋國為卷首，也是為了尊重史實。但他不得不提高滁陽王郭子興的歷史地位，以便下接建立帝王之業的朱元璋。他也不得不尊重他的國朝，故雖稱反元者為叛亂之賊，而獨稱朱元璋之反元為「大明太祖高皇帝起兵」<sup>48</sup>，稱初發跡的朱元璋為「（皇）上」而諱其名號，以至於有「（滁陽）王乃召（皇）上曰」的不倫之筆。這是傳統史筆為了正統與政權的合法性，不得不爾的寫法，但其「不倫」顯而

<sup>44</sup> 朱鴻林：〈錢謙益《國初群雄事略》撰作經過與成書年代推考〉，《明清史集刊》（香港：香港大學中文系，1985年），卷1，頁80、96-97、99。

<sup>45</sup> 《錢牧齋全集》，第7冊，頁491。

<sup>46</sup> 錢謙益：《國初群雄事略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頁1。

<sup>47</sup> 同前註，頁60。

<sup>48</sup> 同前註，頁8。

易見，也有一點諱而不隱的意思。

正因《國初群雄事略》仍屬長編，故敘事多直接襲用史料，亦吾華舊史之傳統，自班固襲用《史記》原文以來，所在多見，而皆不注明出處。牧齋抄錄史料卻一一注明；而其所錄，皆其當時可得之最佳原料，諸如《太祖實錄》、《高皇帝御製文集》、《廟碑》、《元史》、《庚申外史》、《密閣元龜政要》、《明氏實錄》、《天潢玉牒》、高岱《鴻猷錄》、陶宗儀《輟耕錄》、俞本《紀事錄》、劉辰《國初事蹟》、王逢《梧溪集》、祝允明《九朝野紀》、陸深《平胡錄》、童承敘《平漢錄》、葉子奇《草木子》、楊慎《滇載紀》、楊維禎《詠史樂府》、瞿祐《歸田詩話》等等，以及碑銘、序文、縣志、書函諸文獻，包攬所謂國史、家史、野史，排比疏通，穿針引線，先綱舉而後目張，頗見剪裁之功，故群雄雖分見各篇，然其間關係犖然。群雄皆因小明王而起，以紅巾為號，俱有驥可索，諸如陳友諒因弑徐壽輝而王，徐壽輝因妖僧彭瑩玉而王，脈絡清楚，遂免編年體史事復出之煩。即就保存朱明開國史料而言，每由於牧齋的引錄而得以流傳後世，厥功甚偉。

牧齋除博採群籍之外，亦重校勘與考覈，深知「史家之難，其莫難於真偽之辨」<sup>④9</sup>，故雖實錄也不輕信，尤重時、地、人、事四者之辨正。明末有人偽造褚遂良書所謂「故漢太史司馬公侍妾隨清娛墓誌銘」，牧齋點出此碑將太史公頭銜省略為太史，顯然是拙劣的偽作，有謂「聞道紬書如太史，何妨石室貯清娛」<sup>⑤0</sup>。牧齋又據《太祖實錄》指出《元史》書陳友諒於至正二十年(1360)五月弑其主徐壽輝而自王，乃閏五月之誤<sup>⑤1</sup>。在重慶稱帝的明玉珍原來也是徐壽輝所任命的元帥，因陳友諒殺害徐壽輝而自王。據《明氏實錄》玉珍於癸巳(1353)十一月已歸以漢陽為都的徐壽輝，但牧齋指出壽輝於壬辰年(1352)之春攻陷漢陽，翌年五月元將收復漢陽，直到丙申年(1356)之冬，徐壽輝才以漢陽為其國都，距明珍歸壽輝已三年，故實錄所書：「壽輝都漢陽，玉珍歸之。」並不確實<sup>⑤2</sup>。《元史》載丙申年(1356)寇陷淮安，人與事皆不明，牧齋據《太祖實錄》與王逢〈詩序〉考定：在淮安的鎮南王為徐州芝麻李的故將趙君用所殺而城陷；翌年趙君用據淮而王，並考定

<sup>④9</sup> 《有學集》，卷14，頁686。

<sup>⑤0</sup> 《初學集》，卷17，頁600。

<sup>⑤1</sup> 錢謙益：《國初群雄事略》，頁83。

<sup>⑤2</sup> 同前註，頁113。

君用失淮，大約在戊、亥之間(1358-1359)<sup>⑤③</sup>。

壬寅年(1362)，元將李察罕帖木兒攻下山東，江南震動，朱元璋曾遣使通好，但《太祖實錄》只說，元遣使通好而「上不之答」，語焉不詳，顯然有諱。牧齋乃據劉辰的《國初事蹟》所書而發其隱：元朝善意回報元璋之「通好」，賜以榮祿，遂因察罕之死而未果。牧齋認為察罕之死，關係重大，因元璋視察罕為棟樑；棟樑既頹，知元已不可為，故牧齋有云：「吾以為察罕一死，天意灼然歸我明矣。」<sup>⑤④</sup>於此可見，牧齋於考證之餘，亦有議論；易辭言之，設若察罕不死，則元璋或受平章之命；既圖元朝之富貴，則無明矣！牧齋所謂關係之重，乃偶發的事件足可左右全局之改觀，歷史之發展。

郭子興將養女馬氏嫁給朱元璋，固然由於郭氏夫婦之重視朱，亦朱卒能代郭而興的關鍵，然《太祖實錄》僅言郭及其妻張氏「以女妻上」。牧齋考定：郭子興的次夫人亦張姓，賞識朱元璋者乃此張夫人，而非彼張夫人，故曰：「次夫人獨能知帝，又以其女相託，則當時周旋側陋，次夫人之功多矣。」<sup>⑤⑤</sup>牧齋不僅理清了史實，亦可謂發潛德幽光。又若以實錄糾正《皇明本紀》所載彭、趙兩姓稱王的年分，應是癸巳(1353)之冬，而非壬辰(1352)。從徐州逃往濠梁之時，因「二姓雖草草僭王，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，而不在自徐奔濠之日」（《國初群雄事略》，頁49）。《實錄》將與趙一起奔濠之彭大誤作彭大之子早住，因謂彭早住於甲午年(1354)為趙吞併而死，然而牧齋考定彭早住於丁酉年(1357)尚健在，並占據淮安稱王，故死者乃彭父而非彭子。牧齋進而證實己酉年(1369)攻陷盱泗者就是彭、趙的濠兵，而《元史》誤繫之於張士誠寇揚州之下，故牧齋曰：「是時，士誠方起高郵，攻揚州，其兵豈能遽及盱泗？」<sup>⑤⑥</sup>類此辨明人、時、地之錯失，不僅考覈細密，發覆糾謬，頗能照明正史以及《實錄》之幽。

牧齋考史的細密，復可見之於其能以詩證史。元末群雄之中占據常熟一帶的是張士誠、士德兄弟。按《洪武實錄》的記載，士德於丙申年(1356)的秋天被中山王徐達設伏擒之。明太祖為徐達御製的「武寧(徐達的諡號)神道碑」也如是說，

<sup>⑤③</sup> 同前註，頁16。

<sup>⑤④</sup> 同前註，頁34。

<sup>⑤⑤</sup> 同前註，頁47。

<sup>⑤⑥</sup> 同前註，頁53。

應是不爭的事實。然而當牧齋讀到陳基的〈癸卯二月二十日舟中望虞山有感〉云：「一望虞山一悵然，楚公會此將樓船。間關百戰捐軀地，慷慨孤忠罵寇年。填海欲啣精衛石，驅狼願借祖龍鞭。至今父老猶垂淚，花落春城泣杜鵑。」<sup>57</sup>頓時產生了疑惑。楚公就是元朝所贈的楚國公張士德，曾率樓船大戰，而不是中伏被擒；此一情節，難道是詩人的杜撰？但是陳基乃士德幕中之人，而此詩又作於癸卯年(1363)渡江時的舟中，目睹七年前的戰場而有所感，似乎不可能作無稽之虛構。他終於在身任國史的宋文憲所撰《鑿坡後集》中的〈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〉得到另一條線索。武桓是徐達麾下前鋒趙德勝的諡號，碑文說：「丁酉六月戊辰，取江陰；秋七月丙子，攻常熟，張士德出挑戰，公麾兵而進，士德就縛。」證明確有一戰。牧齋遂斷定《實錄》有誤，更加感到史實之難求：「夫史家異同，必取衷於國史，而國史多不足信，至如開國元勳之碑，出自御筆，傳諸琬琰，非他金石之文，所可倫擬，而猶或未免於傳疑。史家之難，豈不信哉！」<sup>58</sup>又張士德被俘後，劉辰說是「不食而死」；陳基的祭文也說：「能厲聲罵賊，而不能與之俱生；能視死如歸，而不能食不義之食。」牧齋以為不食而死者是也，但初不能考定何年何月；然而從王逢的詩句「翼然東崑邱，蘭撩映疏綺」，使牧齋推定張士德實歸葬於崑山<sup>59</sup>。

牧齋又從陳基詩文中探知，陳基與錢用壬除了參佐張士信鎮守杭州外，亦曾參與淮陰軍事，是知張士信也曾出鎮淮陰。既知趙君用於丁酉(1357)之冬仍然占據淮陰，己亥(1359)七月被殺，於是考定當時已經投降元朝的張士誠部奪取淮陰「當在亥、子(1359-1360)之間」。癸卯年(1363)的安豐大戰，劉福通敗亡，實乃宋王韓林兒由盛而衰的關鍵，牧齋同時借陳基的〈官軍發吳門狼山觀兵〉詩中所說：「淮海父兄爭鼓舞，將軍恐是漢金吾。」以駁《月山叢談》所記，「士誠遣其將呂珍為前鋒攻安豐，而自以大兵繼之」<sup>60</sup>的不實。蓋以大兵繼之者，乃張士信而非張士誠。總之，牧齋此書講求史事的考證，可稱極其細密，已發日後乾嘉諸老的先聲。

<sup>57</sup> 同前註，頁158-159。

<sup>58</sup> 同前註，頁161。

<sup>59</sup> 同前註，頁165。

<sup>60</sup> 同前註，頁180。

## 結 論

牧齋史筆，不出傳統中國史學範疇。故深信史不離經，以經史爲一體，經是超越時空的普遍價值，即所謂「道」，而史乃載道之器，亦就是具有高度特殊性之史，有其不可或離的永久價值，而價值不出儒家倫理之外。因而牧齋論史，辨忠奸、講仁義，無疑就是他的基本史觀，而因其生平的不幸遭遇以及降清後的愧疚，更加想借史事來表達忠義，儒家價值觀似乎益發強了。

牧齋以史官自任，以撰寫國史爲其使命，顯然承繼了經世致用的傳統。換言之，史學並不僅爲學問而學問，而是具有致用的目的。暮年遭遇國變，更有國亡史不亡的責任感。故雖絳雲失火，損失慘重；雖年邁體衰，力不從心，仍然念茲在茲想完成國史，並有待於來者。

牧齋史筆，崇尚馬、班。司馬遷首創紀傳體，班固初以斷代爲史，中國傳統史家莫不奉爲典範。牧齋尤其敬服司馬遷，因佩其敘事生動，認爲並無損信實，蓋文筆傳神亦有助於傳真。牧齋雖有主觀的價值標準在胸，有以史致用之目的，然絕無犧牲史事信實的用意。牧齋力求史事中人物、時間、地點的正確，不遺餘力，可謂走在乾嘉考據的前面，並似乎對陳寅恪之箋證風格，亦頗有影響。陳氏頗好牧齋詩文，亦重人、時、地之確認，並善於以詩證史，有牧齋影子，實較牧齋更上層樓。牧齋主張著史，先寫長編；今存之《國朝群雄事略》，顯係長編，匯聚排比史料，考其真偽，偶作按語。寅恪史筆亦排比史料，雖更能穿針引線，經由「寅恪案」指出史事的來龍去脈，見微知著，但基本方法與牧齋彷彿近似。設若牧齋有機會再據長編而寫成定稿，或也能多有勝義，不僅僅主要只留下信而可徵的明初寶貴史料而已。